

荆楚关系问题新探*

尹弘兵

摘要：楚在商代是指楚蛮，西周时始有楚国，古文字中用不同的字形来区分楚蛮与楚国，楚国之楚流行开来后兼指楚国与楚蛮。昭王南征时为区分二者始用荆字来指代楚蛮，楚蛮遂变为荆蛮，西周晚期荆又用指楚国。楚人自称曰楚，到战国时荆也被楚人用作自称。

关键词：楚蛮；荆蛮；楚国；荆国；荆楚关系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3-0073-06

楚国又称荆国，但荆、楚之间的关系，是楚史与楚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古文字与古文献资料中，有单称荆或楚者，亦有荆楚联用者。一般说来荆、楚二字古通用，荆国即楚国，但一国二名，必有其渊源与来历，不能以荆、楚通用，荆即楚的简单说法一带而过。如战国时期的韩国，《战国策》卷14《楚策一》“城浑出周”章称其为郑国，是韩又称郑，当是因韩灭郑后迁都于新郑之故；战国时期的魏国，《孟子》卷1上《梁惠王上》：“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战国策》卷22《魏策一》：“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称曰：‘河山之险，岂不亦信固哉！’王钟侍王，曰：‘此晋国之所以强也。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可见魏人无论君臣均自称晋国，《鄂君启节》铭文则有“大司马邵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是楚人亦称魏为晋，盖因魏国本从晋国分化而来，且战国初期魏为最强之国，独霸中原，继承了春秋时期晋国的霸权地位，故魏有晋国之称，魏惠王迁都大梁之后，魏又称梁，魏惠王亦称梁惠王，是魏国一国三称，皆有来历，非为无因。但楚国为何又称荆国，楚、荆二字之间有何联系、又有什么区别，却是众说纷纭，据王光镐统计，自战国末年以来，对于荆楚关系问题，主要的说法多达五种，一曰荆为州楚为国、二曰先荆后楚、三曰荆为贬称而楚为自号、四曰避秦讳、五曰荆、楚同义^①。

近代以来，学术界对荆楚关系更出新说，王桐岭主张“春秋时代，荆人一支有一强国曰楚，凭籍现在湖北秭归县为根据地”^②，则王氏主楚本系荆之一部，故荆、楚可通。到了上世纪80年代楚文化研究高潮时期，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新说叠出。杨宽认为：“古文献中，楚又名荆或楚荆，西周金文也称荆或楚荆，该即由于楚国以荆山为根据地的缘故”^③，由此提出荆山楚国说。王光镐则倡荆、楚二国说，认为荆、楚本为两

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后来荆融于楚，成了楚国的一部分^④。段渝则认为荆楚本为泛称地名，用指荆棘楚木之地，熊绎建国之后演化为专称国名^⑤。王瑞明则据《尔雅·释地》邢昺疏引李巡云：“江南其气燥刚，稟性强梁，故曰荆。荆，强也”，释荆楚为南方的强国^⑥，是为南方强国说。王廷洽则别出心裁，认为楚非指楚木，而是指竹，荆则可指竹、亦可指荆棘，荆、楚通用时，则专指竹，故楚有优美之意，荆则无此意，故楚人以竹来名国^⑦。

由上可见，虽然学者已对荆、楚关系作了大量研究，几乎穷尽了想像力，但结果却不太令人满意。因此荆、楚关系问题，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由于文献不足征，这一问题被遮掩于历史的重重迷雾之下，但仔细考察，仍可抽丝剥茧，得出若干新的线索。

一、楚与荆

先说“楚”。检索文献，“楚”字大抵有四义，一是指特某种野生林木，《诗经》卷一之三《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楚。”郑笺：“楚者，杂薪之中尤翘翘者。”类似用法在《诗经》中多见，如“葛生蒙楚，蔕蔓于野”（《唐风·葛生》），“绸缪束楚，三星在户”（《唐风·绸缪》），“交交黄鸟，止于楚”（《秦风·黄鸟》），“扬之水，不流束楚”（《王风·扬之水》，此句又见于《郑风·扬之水》），“楚楚者茨，言抽其棘”（《小雅·谷风之什·楚茨》），从《诗经》所述来看，楚是一种分布很广的野生林木，不仅南方，北方地区亦多见。二是指中原某些地区，《左传》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僖公二年：“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襄公十

* 本文得到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工程丹江口库区文物保护科研课题“早期楚文化生成环境研究”（合同编号NK10）资助，特此说明。

年：“宋公享晋侯于楚丘”，昭公二十二年：“王师军于京楚”。这些楚丘、京楚，皆在中原，而这些地方以楚为名，可能与楚木有关，为中原地区的楚木丛生之地^⑧。三是指楚蛮，《史记》卷40《楚世家》：“封熊绎于楚蛮”，《楚世家》又记熊渠称雄江汉，封其三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可知楚蛮为商周时代的一大部族，其历史早于半姓楚国，而楚国则是在楚蛮之地发展起来的，后来楚通荆，故楚蛮又称荆蛮，但文献中一般多见荆蛮而少见楚蛮，如《诗经》中屡有“荆”和“蛮荆”之称，《国语》、《吴世家》、《齐世家》、《汉书》、《竹书纪年》等均称荆蛮。四是指楚国，周成王之时，始封熊绎为诸侯，自此始有半姓楚国，而半姓与“楚”发生交集，亦当自熊绎受封始，此前半姓一族无楚人、楚族之称。

以上四义，第一义可能是楚之本义，楚地、楚蛮、楚国可能均由此而来；第二义是指中原的某些地区，与楚国或楚蛮及荆楚关系无关，故不加讨论；第四义——半姓楚国在“楚”的四义中出现最晚，与荆楚关系亦有关联，但却是流而非源，其出现亦是最晚；而第三义——楚蛮，其历史早于半姓楚国，文献中又有楚蛮与荆蛮两称，就此而论，理清荆蛮与楚蛮的起源及演变的过程、其与半姓楚国的关系等，对于探讨荆、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后世楚通荆，我们暂且以楚蛮即荆蛮来讨论。荆蛮最早出现于夏末商初，今本《竹书纪年》：“（帝癸）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帝癸即夏桀，可见夏末商初时荆蛮已出现。《越绝书·吴内传》则谓：“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当是时，荆伯未从也，汤于是乃饰牺牛以事，荆伯乃愧然曰：‘失事圣人礼’。乃委其诚心，此谓汤献牛荆之伯也。”这两条文献虽然年代较晚，但至少可以说明在后代人的记忆中，荆蛮于夏商之际时已经存在，至于荆服于商，是行征伐还是行仁义的结果，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商代后期，武丁曾伐荆蛮。今本《竹书纪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此事又见于《诗经·商颂·殷武》：“挾彼殷武，奋伐荆楚。罍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殷武即殷王武丁，是商人赞颂武丁功绩的诗篇，从《殷武》所载来看，荆蛮在商汤之时已臣服于商，此亦商初时已有荆蛮之旁证。又据《史记》卷3《殷本纪》：“自中丁以来，废適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九世之乱”期间，商朝国力衰微，可能因此失去对荆蛮的控制，盘庚迁殷之后，商朝国势复振，尤其是武丁时，大征四方，武丁征荆楚，当在此背景下发生。这两条文献互证，可知商代后期时，荆蛮已相当强大，居于南方、占地广泛。

又武丁伐荆楚一事，亦见于甲骨文：

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與(举)，左比曾。



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

[中]比與(举)，左比[曾]。十二月。^⑨

这两条甲骨文均属武丁时代，“立”，即莅；“事”，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戎事。“立事于南”，是说商王武丁亲临南方，指挥战争。我、曾、举均为商代方国，据李学勤先生考证，曾在今湖北、枣阳、京山到河南新野这一范围内，举在汉东举水流域^⑩，我的地望则不可考，当与曾、举相邻。“比”则有联合、配合之义^⑪，学者经研究后认为，这两条卜辞所述，即武丁伐荆楚之事：商王武丁亲帅右、中、左三军，在我、举、曾三个方国的配合下征伐荆楚^⑫。

周初时，则有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西汉贾捐之亦曾述及商周王朝与荆蛮的关系：“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而颂声作。”^⑬西周晚期，熊渠称雄江汉，并封其三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⑭，是楚蛮(荆蛮)又见于西周时期，至春秋早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⑮，以后楚蛮不见于记载。

可见在后世文献中，荆蛮即楚蛮。对楚蛮(荆蛮)的族源，学者有较一致的看法，均认为楚蛮为古三苗之后：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谓：“所谓楚蛮，即楚地的蛮族，其主体是三苗的遗裔”^⑯；张正明《楚史》同此说，亦谓楚蛮的主体应是传说时代“三苗”的遗裔^⑰；伍新福认为商周时期的荆蛮是原三苗的后裔，“他们经过数百年的较为和平的发展后，势力又强盛起来，同中原华夏族发生接触和冲突，中原人就不再把他们叫作‘三苗’、‘有苗’，而以地命名，称之为荆蛮。其实，他们就是三苗的后裔”^⑱；刘玉堂亦认为禹征三苗之后，“以三苗遗部为主体的‘荆’或‘荆蛮’成为江汉地区的主要民族”^⑲。按学者认定楚蛮或荆蛮为古三苗之后，除了居地相同、时代相接外，也因苗与蛮实为一义，徐旭生说：“这个集团，古人有时叫它作蛮，有时叫它作苗，我们感觉不到这两个名词中间有什么分别，所以就综括两名词，叫它作苗蛮。”^⑳石宗仁从民族学和语言学角度论证，Mao(或Mu)一髦一蛮一模一猫一苗均为同音异译，至今中部苗族犹以猫(Mao)或模(Mu)即蛮为自称^㉑，而荆蛮、三苗、苗族为同一族群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㉒。

但殷墟甲骨文中只有“楚”而无“荆”。殷墟甲骨文中二类“楚”字，一类为地名，从林或木又从，字形为，皆出自郭沫若《殷契粹编》：

岳于南单，岳于三门，岳于楚。(《殷契粹编》七三)



于楚又雨。(《殷契粹编》一五四七)

刚于楚。(《殷契粹编》四五〇)

甲申卜午楚高。(《殷契粹编》一三一五)

甲骨文中的上述楚字，从文义来看，均为地名，其地理范围，郭沫若认为即河南滑县的楚丘^㉓，陈梦家泛言在周代卫国境内，所指亦为河南滑县的楚丘^㉔，徐仲舒认为

这些地名“为王田猎所及之地，似不能远至荆楚”^②，王光镐认为这些“楚”字“皆为地理名称，是专门用来代指位在中原的某些地方的”^③。可见，对于甲骨文中的上述楚地，学术界有较一致的看法，认定其与江汉楚国无关，也与后来的荆楚关系无关。

殷墟甲骨文中还有另外一类楚字，此类楚字均与“妇”连称，从林从，字形为：

妇楚。（《小屯殷墟文字丙编》六三）

妇楚来。（《殷墟文字缀合》二一九）

辛卯妇楚。（《殷墟卜辞》二三六四）

对于这类“妇楚”，学术界的看法颇不一致，胡厚宣、丁山等认为与江汉楚国有关，如胡厚宣认定“殷商必早有楚国，则可信而不可疑也”，其依据即是“‘楚’字果已见于甲骨文矣”^④。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亦有类似看法，认为甲骨文中的我、楚诸名，必然都是我氏、楚氏的简称，而“殷商王朝，每个氏族，都有食邑，所有的氏族，就是城主，也就是诸侯了”^⑤。王光镐则认为“妇楚”之“楚”字所释有误，此字当是“杞”字而非“楚”字^⑥。

作者对古文字认识有限，对此字是否释楚，不敢置评。以作者浅见，既然古文字学界释此字为楚，则当尊重古文字学界的主流看法。但甲骨文中的“妇楚”，确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熊绎受封之前，并无半姓楚国的存在，但从《楚世家》“封熊绎于楚蛮”来看，熊绎受封之前已有楚蛮，为世居南方的土著民族。王光镐有一个著名的看法叫做“商代无楚”^⑦，我们赞成商代无楚国，但《楚世家》明记商代有楚蛮，因此甲骨文中的“妇楚”之“楚”，就只能是指楚蛮。

由上可知，“楚”早于“荆”，“楚”字最初出现时，是指商周时期由古三苗遗裔发展而来的楚蛮，并非是指半姓楚国。但在后世文献中，楚蛮却变成了荆蛮，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






二、从楚蛮到荆蛮

依据殷墟甲骨文中的资料，我们已知商代时有“楚”无“荆”，只有楚蛮而无荆蛮，更谈不上楚国或荆国。到西周初年时，仍是有“楚”无“荆”。周原甲骨的年代为周初，其中有二例“楚子”：

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H11：83）

其微、楚师，师氏受奭。（H11：4）^⑧

这二例“楚”，学术界一般认为系指周代之半姓楚国。《楚世家》记楚立国曰：“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以周原甲骨与《史记》互证，可知周初之时，仍是有“楚”无“荆”，只有从商代延续下来的楚蛮与新建之楚国，并无荆蛮与荆国之称。

但殷墟甲骨的“楚”字与周原甲骨的“楚”字写法有异，殷墟甲骨中，“妇楚”之楚从林从，字形为，中原地名之楚从林或木又从，字形为，周原甲骨中的楚则是从林从足，字形为，与金文中的楚国之楚结

构相同，王光镐据此认为“妇楚”之“楚”断非楚，而是“杞”，只有周原甲骨中的“楚”字才是楚国之楚^⑨。

能敏锐地注意到三型“楚”字的差异，此乃学者的卓识，但由此而否定古文字学界的普遍看法，则恐不可取，这种字形的差异亦可能是有别的原因。周原甲骨中的“楚国”之“楚”与殷墟甲骨中的“妇楚”及“楚”地之“楚”字形有异，可能是为了区分字义的需要：就殷墟甲骨文而言，“妇楚”之楚与中原“楚”地之楚各有不同的含义，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故用不同的字形来加以区分，到了熊绎封于楚蛮之地时，以楚名国，建国曰楚，这样一来，就是在原有的中原楚地、南方楚蛮之外，又有了一个新的含义：半姓楚国。为了反映这个新的含义——指代半姓楚国并与中原楚地、南方楚蛮相区别，就需要有一个字形不同的新字，于是出现了周原甲骨中的从足之“楚”。王光镐早年即指出：“‘足’楚最早见于周原卜辞，似应出于周人的创造，它应是特为代指当时的半姓楚国应运而生的”^⑩。这种情形应该说是符合文字发展规律的，随着字义的扩展，字形也随之发生变化。

到周昭王时代，金文中开始出现“荆”字，目前最早的“荆”字出自昭王时的铜器《鬲簋》。昭王时最重要的事件是南征江汉地区，南征的对象是“楚”或“荆”，金文中对此记载颇多：

《令簋》：唯王于伐楚伯，在炎。^⑪

《扶馭簋》：扶馭從王南征，伐楚荆，有得，用作父戊寶尊彝。^⑫

《過伯簋》：過伯從王伐反荆，孚金，用作宗室寶尊彝。^⑬

《鴻叔簋》：唯九月，鴻叔從王員征楚荆，在成周，讀作寶簋。^⑭

《鬲簋》：鬲從王伐荆，孚，用作鬲簋。^⑮

《墻盤》：宏魯昭王，廣敵楚荆，唯寡南行。^⑯

上述诸器，除《墻盤》外，学界一般认为系昭王时器，所记诸事与周昭王南征有关^⑰。由这些金文材料中可知，对于昭王南征的对象，金文中或言“伐楚”，或言“伐荆”、“伐反荆”，或楚荆并用曰“伐楚荆”。对于这些楚或荆、荆楚、楚荆，学界的流行看法一般认为是指半姓楚国，此言有误。按昭王南征的区域均在汉水以东地区，汉东地区在西周时期与半姓楚国无关，且西周早期时楚国尚为弱小之国，不可能是昭王尽起六师征伐的对象，早期的楚国贫弱至极，也不可能有贵金属供昭王掠夺，可见昭王南征的对象并不是通常认为的半姓楚国，而应是汉东地区的土著民族，这些土著民族可能就是史籍中记载的楚蛮（或称荆蛮）^⑱。

由此看来，以“荆”字指称南国江汉地区的土著居民，乃至楚荆并用、互用，始于周昭王时，其事可能与昭王南征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如果昭王南征的对象并不是楚国，而是商周时期居住在江汉地区的楚蛮民族，于是昭王南征楚蛮就产生了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即楚国与楚蛮如何区分？西周初年，

周人可能是用不同的字形来区分楚国与楚蛮的：在周原甲骨中有专指楚国的“楚子”之“楚”，殷墟甲骨中有专指楚蛮的“妇楚”之“楚”，这两个“楚”字的写法是不一样的。但这种用字形来区分字义的做法到了昭王时代发生了变化，由于楚国是周的封国，周楚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于是本来专指楚国的从足之“楚”字就流行开来，结果，原来专指楚国的从足之“楚”字，就从专指楚国变成了兼指楚国与楚蛮。昭王时的铜器铭文中，《狄馭簋》中有“伐楚荆”，《鸿叔簋》中有“征楚荆”，其楚字字形都是一样的，均从足从林，与金文中的楚国之“楚”完全一致，学者一致认为，这几篇金文应与昭王南征有关。而昭王南征的对象并不是楚国，而是楚蛮。由此可见，到昭王时代，周人已习用从足之楚字来兼指楚国与楚蛮。在南方无事的情况下，这样做或许并无不妥，但到昭王大举南征楚蛮时，原来隐藏着的问题暴露出来，西周史官就会吃惊地发现，他们需要区分楚国与楚蛮：楚国是周的封国，楚蛮却是周朝的征伐对象，可是一个“楚”字下来到底是伐楚国还是伐楚蛮呢？对于文书系统来说，这可是个大问题。如果周昭王南征对象确为楚蛮的话，那么，昭王南征就必然使得楚国与楚蛮相混的问题浮出水面，由此导致西周史官采取措施区分楚国与楚蛮，就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

上述金文资料还表明，昭王南征时才出现“荆”的称呼，始用“荆”字来指称南国江汉地区的居民。上引金文中，言“伐楚”者仅有《令簋》一例，言“伐楚荆”者有《狄馭簋》、《鸿叔簋》和《墙盘》三例，单言“荆”者有《遏伯簋》、《鼐簋》二例。由此可知，昭王时代，周人虽然开始用“荆”字来指称南方居民，但仍然沿用自商代流传下来的“楚”字用指南方居民，只是此“楚”字改成了周原甲骨文中的从足之楚字，或“楚荆”二字并用，似乎周人对南方居民的称呼有一个从“楚”到“楚荆”再到“荆”的发展过程。

由此可见，用“荆”字指称楚蛮是周人区分楚国与楚蛮的结果，自“荆”字出现以后，“荆”遂成为周人称呼楚蛮的专名。古文献中（此处古文献指直接文献）荆蛮一词则最早见于《诗经·小雅·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讐”，蛮荆即荆蛮，按《采芑》一诗作于周宣王时，系周人歌颂宣王时大臣方叔南征荆蛮之作。以《诗经·采芑》与金文中“伐楚荆”、“伐荆”、“伐反荆”互证，可知周人自昭王时开始以“荆”代“楚”称呼南方的楚蛮居民，到宣王时便只有荆蛮而无楚蛮，以后中原文献在称呼长江中游的原楚蛮居民时，“荆”越来越流行，《国语·晋语》云“楚为荆蛮”，《吕氏春秋》则云“周昭王亲将征荆蛮”，这样，楚蛮就在传世文献中变成了荆蛮。再往后，荆蛮一词扩大化，《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并见《周本纪》）记太伯、仲雍奔吴云：“于是太伯、仲雍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班固《地理志》：“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连长江下游地区的居民亦被称为荆蛮，“荆蛮”一词更进一步演变成了中原人对南方居民的通用称呼。

三、西周时期荆楚关系的产生及其演变

由上分析可见，荆楚关系的产生的背景是昭王南征，由于昭王南征，楚国与楚蛮相混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于是西周史官便改用“荆”字来专指楚蛮，原有的“楚”字则专指楚国，用这样的方法来区分楚国与楚蛮。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以后，这种荆、楚二分的方法看来很快在周朝的文书系统中流行开来，在周宣王时周人歌咏大臣方叔南征的作品《诗经·小雅·采芑》中，只见荆蛮或蛮荆，而无楚蛮。

但荆、楚二分的清晰局面只持续了一段不长的时间，昭王南征使得楚蛮与周朝两败俱伤，这给楚国摆脱周朝的控制、南下深入楚蛮腹地寻求发展创造了天赐良机。而楚国进入楚蛮腹地的结果，必然是楚国的楚蛮化，从文献来看，至迟熊渠时，楚国已与楚蛮初步融为一体，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其活动区域也是“江上楚蛮之地”，可见楚国成了楚蛮的首领。随着楚国的楚蛮化，周人也视楚国为楚蛮，本来专指楚蛮的“荆”字，周人也用之来代指楚国了，于是楚国也可称“荆”。西周末年时，天灾人祸不断，有先见之明的贵族都在东方准备后路，郑桓公时为司徒，乃问计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建议桓公迁到济、洛、河、颍之间，但桓公似乎并不满意，反问史伯曰：“南方不可乎？”史伯回答：“夫荆子熊严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紂。叔熊逃难于濮而蛮，季紂是立，鬻氏将起之，祸又不克。是天启之心也，又甚聪明和协，盖其先王。臣闻之，天之所启，十世不替。夫其子孙必光启土，不可偪也。”^②此处史伯明称楚国为“荆”，是文献中首见周人称楚国为“荆”之例。分析可见，由于楚国的楚蛮化，荆、楚关系又再度变得复杂起来。本来“荆”字指代楚蛮是因为从足之“楚”字的含义发生了变化，由专指半姓楚国变成了兼指楚国与楚蛮，为了区分楚国与楚蛮，周人又改用“荆”字来专指楚蛮，改称楚蛮为荆蛮，“楚”则专指楚国。但楚国也成了荆蛮之后，“荆”字的含义也变得复杂起来，“荆”由专指楚蛮也变成了兼指楚国与楚蛮。荆、楚互通，当自此时始。

另一方面，由于“荆”字出现时是专指与周朝为敌的蛮族，故“荆”字由此带有贬义，成了周人的某种意识形态。学者对此，很早即有所认识，《谷梁传》庄公十年：“荆者，楚也，何为谓之荆？狄之也。”郭沫若也认为：“旧文献中每视荆舒为蛮夷化外，足徵乃出于周人之敌忾。”^③观之《诗经》，凡叙及荆事时，大都有敌忾之意，如《诗经·小雅·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嘒嘒，嘒嘒焯焯，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诗经·鲁颂·閟宫》：“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殷武》则谓：“奋伐荆楚。隳入其阻，裒荆之旅”。按《采芑》为周诗，《閟宫》为鲁诗，此皆周文化之正宗，至于《殷武》虽是商诗，但却是得之于周大师处，复经宋大夫正考父校之，在此过程中亦可能加入了周人的意

识形态。于是荆蛮一词成了周人对南方民族的一种带贬义的称呼，由于周文化为华夏正统，在周文化的意识形态之下，后世文献在叙及前代史事之时，便沿用了周人对南方居民的贬称，多用“荆蛮”一词来称呼商周时期的南方居民。

四、东周时期荆楚关系的持续演变

以“荆”字指称楚国与楚蛮，这是周人的话语。在楚国这方面，楚人自称为楚，并不自称荆，如西周晚期的《楚公冢钟》：“楚公冢自作宝大林夔钟”^④，春秋早期的《楚屈叔佗戈》：“楚屈叔佗之元用”^⑤，春秋晚期的《楚叔之孙棚鼎》：“楚叔之孙棚”^⑥，战国早期的《楚王禽章钟、罍》：“楚王禽章作曾侯乙宗彝”^⑦，皆可证楚人自称曰“楚”而非“荆”。

但东周时期楚国的迅速发展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荆、楚关系的演进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首先是楚国与楚蛮的关系完全逆转，西周时期，弱小的楚国为求发展深入楚蛮腹地，由此导致了楚国的楚蛮化，而楚国楚蛮化的结果，使周人将原来专指楚蛮、含有贬义的“荆”字也用来指代楚国。东周时期的情形却完全倒了过来，楚国的发展极为迅猛，楚蛮尽为楚国所并。齐桓公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疆。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⑧。所谓“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当是指楚蛮被楚国完全兼并。这是楚蛮最后一次出现在历史上，此后楚蛮作为一个部族不再存在。

随着楚国的强盛，楚国在文化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东周时期楚国大力吸收中原文化，融合各种土著文化，形成了高度发达的楚文化。楚国的强盛与楚文化的高度发达，使得楚蛮民族楚国化了。这使得荆楚关系又发生了变化，“荆”字自西周末年以后便兼指楚国与楚蛮，但东周时期楚蛮的消失使得“荆”只有楚国这一个指代对象了，于是“荆”便成了楚国的别称，楚蛮消失的结果，使得荆就是楚、楚就是荆，荆国就是楚国，楚国就是荆国，这是内因。在外因方面，楚国与楚文化的高度发展使得周、楚之间的地位也发生了逆转。到了战国时期，周王室成了微不足道的小诸侯，而楚国成为中原列强，楚文化也随之成为华夏主流之一，完全摆脱了从前的夷狄身分和边缘文化的地位。同时，由于楚文化是在大力吸收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象“荆”这类周文化中的特定话语也进入到了楚文化中，而楚国与楚文化的强势又使得楚人并不介意使用这类原来的贬称来指代自身。包山楚简 246 中就有荆王之称；祷荆王自熊绎以庚武王，五牛、五豕^⑨，可见，虽然周人最初使用“荆”字时确带有贬义，但战国时期，由于周、楚之间的政治地位与文化地位的逆转，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荆”字已不再带有原来的意识形态含义，楚人也并不讳言“荆”字。这样，在文化的转型过程中，原本具有特殊含义的“荆”字也丧失了其在原先话语中的贬义，成为一个普通的字。到了此时，荆、楚二字始可

完全互通。

战国晚期，又发生了因秦庄襄王名子楚，故秦避庄襄王讳，改楚为荆的事件。据《史记》记载，秦庄襄王“本名子异，后为华阳夫人嗣。夫人楚人，因改名子楚也”^⑩，东汉人贾逵言：“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遂行于世。”^⑪后世注家多从此说。如裴駰《史记集解》云：“徐广曰：秦讳楚，故云荆也。”张守节《史记正义》谓：“秦号楚为荆者，以庄襄王名子楚，讳之，故言荆也。”《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则曰：“秦讳楚，故其国纪率谓楚为荆。”由此产生了荆楚关系上的避秦讳说。检之《吕氏春秋》，凡称楚国者，绝大多数称“荆”，但仍有少数地方称“楚”，可见秦国避庄襄王讳称楚为荆确实存在，但并不严格。秦国因避讳而改楚为荆之事，只不过是荆、楚关系上的最后一道余波而已，并没有对荆、楚关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只是使得称楚为荆更加流行。而不久之后，就是秦灭楚，一统天下，荆、楚关系的发展与演进也就此终结。

五、结语

综上所述，荆楚关系的产生，是与文字的发展及其变化紧密相关，而文字的演进又是与历史发展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早期文字可能是用不同的字形来区分字义，但这显然容易造成混淆，因此这种过于复杂的方法在文字的演进中很容易被淘汰，作为文字自然淘汰的结果之一，楚国之“楚”字由于使用频率较高，就会固定下来，由专指楚国变成兼指楚国与楚蛮。但由于昭王南征楚蛮，导至周人须采取措施来将两者区分开来，于是西周史官又用“荆”字来代指楚蛮，这样，荆、楚二分，荆指楚蛮、楚指楚国。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字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荆字出现时本来是专指楚蛮，并带有强烈的贬义，西周晚期以后由于楚国的楚蛮化，周人也开始用“荆”字来指代楚国。东周时期楚蛮消失，荆字就只剩下楚国这一个指代对象，于是荆、楚互通，荆就是楚、楚就是荆。

至于荆字在周人的话语中原本带有的贬义，也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东周时期由于楚国的强盛及楚文化的高度发达，加上周、楚之间政治与文化地位的逆转，楚人也不介意使用“荆”来自称，而荆字原来所带有的周人对南方民族的歧视色彩也就消失了。

注释：

① 王光镐：《荆楚名实综议》，载《楚史论丛》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②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北平文化学社 1924 年版。

③ 杨宽：《西周时代的楚国》，《江汉论坛》1981 年第 5 期。

④ 王光镐：《荆楚名实综议》，载《楚史论丛》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王光镐：《黄陂鲁台山西周遗存国属初论》，《江汉考古》1983 年第 4 期。

⑤ 段渝：《荆楚国名问题》，《江汉论坛》1984 年第 8 期。

⑥ 王瑞明：《荆楚释名》，《江汉论坛》1980 年第 1 期。

⑦ 王廷洽：《荆楚国名考释》，《民族论坛》1995年第1期。

⑧⑩⑬ 王光镐：《商代无楚》，《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

⑨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甲骨文合集》第3册，第5504、5512片，中华书局1978年版。

⑩ 江鸿：《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

⑪ 林云：《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⑫ 罗运环：《楚国八百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8页。

⑬ 《汉书》卷64《贾捐之传》。

⑭ 《史记》卷40《楚世家》。

⑮ 《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

⑯ 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⑰ 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⑱ 伍新福：《荆蛮、楚人与苗族关系新探》，《求索》1988年第4期。

⑲ 刘玉堂：《夏商王朝对江汉地区的镇抚》，《江汉考古》2001年第1期。

⑳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㉑ 石宗仁：《苗族自称与荆地蛮夷、熊绎之关系》，《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㉒ 石宗仁：《苗族与楚国关系新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㉓ 郭沫若：《殷契粹编》，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考释第15页。

㉔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㉕ 徐仲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载《徐仲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69页。

㉖②③④ 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2、53、52-53页。

㉗ 胡厚宣：《楚民族源于东方考》，《史学论丛》第1册，北京大学潜社1934年印行。

㉘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6、44页。

㉙ 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

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4300、4301，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编《金文引得》5038，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按《令簋》铭文无绝对纪年，其年代有成王、康王、昭王三说，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认为《令簋》系成王时器，唐兰则认为《令簋》系昭王时器，说参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载《古文字研究》第2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王光镐则据类型学从器型上考证《令簋》系昭王时器，说见王光镐《商代无楚》，《江汉论坛》1984年第1期；彭裕商则从纹饰、铭文字体、辞例诸方面断为昭世，参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257、258页。

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3976，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金文引得》4850，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3907，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金文引得》4819，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㉝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3950、3951，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金文引得》4843，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3732，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金文引得》4703，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10175，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金文引得》5411，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㊱ 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2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㊲ 参拙文《周昭王南征对象考》，《人文杂志》2008年第2期。

㊳ 《国语》卷16《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章。

㊴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序》，载郭沫若《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12页。

㊵ 罗西章：《陕西周原新出土的青铜器》，《考古》1999年第4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金文引得》0043、0048，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11198，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金文引得》7219，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2357，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金文引得》6402，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㊸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0083、0085，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金文引得》6149，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㊹ 《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

㊺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㊻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句下《索隐》。

㊼ 《汉书》卷1《高帝纪下》“荆王臣信等十人”句下颜师古注引。

作者简介：尹弘兵，男，1967年生，湖北天门人，历史学博士，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7。

(责任编辑 张卫东)